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國際體系層級的建構與霸權統治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and Hegemonic Domination

doi:10.30390/ISC.200704_46(2).0002

問題與研究, 46(2), 2007

Issues & Studies, 46(2), 2007

作者/Author： 陳欣之(Hsin-Chih Chen)

頁數/Page： 23-5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704_46\(2\).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704_46(2).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際體系層級的建構與霸權統治*

陳欣之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摘要

國際關係理論多集中於討論無政府狀態 (anarchy) 假設延伸下的國家互動，對國際體系中的層級 (hierarchy) 現象，並沒有多所注意。尤其新現實主義的研究典範，忽略國際體系發生層級結構的可能性，更輕視討論層級結構的價值。

層級結構是國家在國際體系內追求發展與生存的過程中，所衍生出一種權力分配暨權威 (authority) 規範的建構結果。霸權穩定論 (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 與權力轉移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從權力分配角度對國際層級作出初步的探索。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討論霸權運用國際制度取得正當性統治的形式，不過沒有觸及權威對霸權統治的影響。

層級結構不單單是相對國家間掌握權力資源高低所形成的等級，更代表了強權國家對弱勢國家所擁有的權力作用。此種權力的支配作用，會因為彼此關係的制度化，而具備權威的正當性，進而降低了霸權統治從屬國的成本，更舒緩了權力資源分配變化對霸權更迭的作用。國際體系中的層級結構，具有行為者權力資源分配不對稱、國際權威地位差別化、行使國際權利不對等及決定國際規範議程能力失衡等特徵。

層級並不是單純地物質力量分配的結果，而是國際物質權力分配與國際觀念分配互構下的產物。運用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與權威規範密度作為評比項目，吾人可以得到國際體系的無層級原始狀態、鼎立附庸、大國協調、兩極鬆散、兩雄扈從、制度兩霸、朝貢體系、單極順服與全球帝國等不同的國際層級類型。在不同的層級結構中，霸權統治方式與統治成效均有所不同。

關鍵詞：層級、權威、權力分配、霸權、國際社會化

* * *

* 本文初稿曾以「國際體系層級的建構與國家行為」為題，發表於中國政治學會 2006 年度學術研討會，感謝論文評論人台灣大學政治系高朗教授的指正與寶貴建議。匿名審查委員的批評與修改建議，更益發增添了本文的學術價值，謹此一併致上最高的謝忱。本文源自於國家科學委員會專案研究計畫 (95-2414-H-006-007-MY3) 之部份研究成果，對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支持，敬致感謝之意。

壹、前言

美國 2003 年攻佔伊拉克事件，引發國際關係研究學界對於帝國（empire）、霸權（hegemony）及單極體系（unipolar system）等概念的探索，除了檢視權力集中於體系內某一個國家所造成的影響之外，國際體系層級（hierarchy）結構，亦成為探索國際體系暨國家行為時，所難以規避的一個嚴肅課題。

國際關係理論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出發，專注於大國之間的互動對國際體系的影響，^①很少著墨大國與小國之間的不對等關係，更忽視這種層級結構在國際體系中的整體面貌。國際關係理論多以權力作為變數，解釋國際體系的變遷與國家的行為，很少區別具備正當性的權威以及不具正當性的強制力二者在國際體系內的不同作用，以為赤裸裸的強制力就是所有權力的代表，很少討論正當性權威在實現國家利益時所扮演的角色。國際關係理論雖對霸權有很多的討論，但是仍無法掙脫霸權戰爭的陰影，以為霸權的更迭難免一戰，卻無從解釋二十世紀英美霸業和平轉移的事實，對霸權如何統治全球，維持其霸業的手段與成效，亦有待投入必要的關注。

探索國際體系的層級結構，將有助於從另一個思路解釋這些在國際關係研究有待澄明的問題，並且開拓另一番新的研究天地，突破國際關係理論無法解釋國際體系歷史變遷的困境。本文首先將敘述國際體系內層級的意義暨特徵；其次從國家互動實踐的過程，描述層級結構的建構；隨後解析多極、兩極與單極權力分配的層級結構，探索霸權在不同層級結構中的統治方式與統治成本，並試圖就現有的發現，對國際關係的霸權更迭解釋，提出補充性的看法。

貳、國際無政府狀態與層級

國際關係理論多集中於討論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對國家行為所形成的作用，以及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可能互動，對於國際體系中的層級結構，並沒有多所注意。尤其新現實主義的研究典範，忽略國際體系發生層級結構的可能性及持續性，更削弱了討論層級結構的價值。

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強調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作用，排拒國際體系內發生層級的可能性，^②而且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暨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亦都接受了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假設，^③忽視國際體系發生層級結構的可能性。新現實主義宗師華茲（Kenneth Waltz）以為，無政府狀

註① 此種論述的重要代表性觀點，首推新現實主義的宗師華茲。請參考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註② *Ibid.*, pp. 114~116.

註③ 請參考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態與層級乃是相斥性的，^④華茲詮釋的無政府秩序及層級秩序中，層級是專業化單位間的社會分工；在無政府狀態中，單元的相似性及單元間的關係完全由能力來決定，進而描繪出一個純粹的政治暨權力場域，而單元間的一切互動，都不受任何行政機構暨權威（administration and authority）的限制所指導。相反地，華茲認為，層級結構內，各部份的極端差異暨單位功能的分化，產生了徹底的權威暨行政管理之場域，完全不受政治暨權力的影響。^⑤華茲從觀察國內政治的活動作出評論，以為層級乃是單元間的上下關係（in relations of super-and subordination），^⑥故而以為要能夠運用權力暨政治的角度檢解析國際關係；在兩相排斥的無政府暨層級結構中，運用層級結構來分析國際體系，無疑是一個不適當的理論出發點。

總結華茲對無政府狀態暨層級的二分法分析，產生了對無政府狀態的三種認識：第一，是將無政府狀態視為缺乏中央權威，此點暗示國際政治是主權平等國家間的分權式競爭（decentralized competition）；第二，華茲以為由於缺乏對武力的中央控制，無政府狀態暗示國際政治是一個基本上依賴武力的自助體系（self-help）；最後，華茲以為國內政治體現的是行政暨法律的權威領域，而國際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politics）。^⑦華茲認為，由於國際體系缺乏一個具備跨越體系權威的行為者，從而無法建立正式的上下關係，故而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⑧層級在華茲的眼中，意謂存在中央權威、不需要依賴自助之相似單元間的專業化分工，以及一個由權威而非權力所主宰的場域；即使國際結構中的層級因素制約了國家主權的行使，但其施行方式仍強烈地受到更高的無政府體系所拘束，^⑨也就是層級往往運作於無政府狀態的秩序之下。

不過華茲對無政府與層級的二分法解析，扭曲了層級結構存在於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的事實，誤導了吾人對國際體系的描述及解釋，尤其限制了進一步開拓國際關係分析及預測的可能性。首先，華茲錯誤地將層級置於無政府狀態的對立面。無政府狀態的反面狀態，並不是層級，而是有政府狀態（archy），也就是存在政府統治權威的意思。^⑩

第二，華茲並沒有全面掌握到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的核心因素並非是否存在層級結構，而是國際體系缺乏被視為正當的權力，也就是缺乏中央權威，^⑪此點是否得以推

註④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4.

註⑤ *Ibid.*, p. 115.

註⑥ *Ibid.*, p. 81.

註⑦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3.

註⑧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8.

註⑨ *Ibid.*, pp. 115-116.

註⑩ Jack Donnelly, "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2 (2006), p. 141.

註⑪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2 (1999), p. 400.

論國際體系內難以建構國際權威並發揮重要的影響，顯然仍有待商榷。華茲以爲國家間的互動暨國際體系的運作主宰，僅是赤裸裸的權力脅迫，忽視了國際體系內所有具備權威或是部份權威性的權力施展，更忽略行爲者之所以採取某種行爲的動因，除了畏懼暴力脅迫外，還有誘之以利的自利考量，以及規範被內化後的有所爲暨有所不爲。¹²華茲更沒有跳脫出層級就是政府結構或是上下關係的窠臼，忽視根基於不對稱安排的非正式上下統治關係。¹³

第三，華茲認爲國際體系內各單元間享有主權平等的基石，故而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缺乏中央權威，但是在討論到國際體系內能力分配時，卻又以爲國際間能力分配是集中於少數強權國家，具有中央化的特徵。華茲並沒有發現，國家平等與權力高度分化的假設，在經驗上並不正確，而在啓發上亦沒有用。¹⁴最後，華茲意圖以權力作爲解釋國際體系運作的唯一指標，刻意區別權力與權威，卻又以爲權威的來源就是類似國內政治的政府形式，故而爲追求建立國際理論的簡約性，排斥所有被視爲具有權威的治理形式，將政府與層級劃上等號，作爲無政府狀態的對立形式與相異內涵。殊不知權威有多種形式，或有正式組織架構的政府，亦有非正式架構的國際制度，而無政府狀態下亦可能存在層級的形式。華茲爲建立簡約化理論的目的，凸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卻忽略了層級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與現象。

即使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相對國家間仍有可能發生層級的現象。¹⁵新現實主義以體系內權力集中於一國、兩國或多國的方法，作爲決定國際體系結構的指標，同時亦暗示國際體系行爲者之間存在權力的層級面貌；因爲很明顯地，強權國家的地位及所掌握的資源，遠遠超出大部份的一般小國。雷克 (David A. Lake) 就指出，層級一直是國際關係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從古早的帝國到十九世紀殖民地的存在，國際關係中的層級結構十分明顯。¹⁶層級結構不單是相對國家間掌握權力資源高低所形成的等級，更代表了強權國家對弱勢國家所擁有的權力作用，而且此種權力的支配作用，會因爲彼此關係的制度化，而具備權威的正當性。¹⁷英國學派 (English School) 更推翻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無政府狀態與國家中心主義，強調新現實主義認定國際體系結構時，僅關注軍事政治領域，忽略了經濟領域與社會文化領域，進而忽視國際體系從無政府狀態轉向層級狀態，而且又從層級狀態轉換爲無政府狀態的歷史事實。¹⁸國際無政

註¹² 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83-389;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68-307.

註¹³ Nicholas Onuf and Frank F. Klink, "Anarchy, Authority, Ru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2 (1989), pp. 166-167.

註¹⁴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p. 156.

註¹⁵ David A. 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1 (1996), p. 6.

註¹⁶ David A. Lake, "The New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3 (2003), p. 304.

註¹⁷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4 (1995), p. 690.

註¹⁸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84.



府狀態並不能排除產生國際層級結構的可能，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權力分配不對稱而且存在上下從屬權威關係，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參、國際層級的定義

吾人可以從三個方向分析國際層級結構。第一個方向是純粹討論物資權力資源在全球分配中的等級。國際政治常運用超級強權 (super power)、強權 (power)、次等強權 (secondary power)、中等強權 (medium power) 或是弱國的詞彙，反映了以權力資源分配的高低作為理解基礎的國際體系層級。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與世界體系理論 (world system theory) 所指稱的核心 (core)、半邊陲 (semi-periphery) 與邊陲 (periphery) 的概念暨分類，^⑩亦呼應著國際體系內存在權力暨地位不等的高低階級。

吉爾平 (Robert Gilpin) 與權力轉移論者所揭示的霸權更迭，是運用物質權力分配方式來解析層級的代表。吉爾平認為國家都有追求擴張的目標，也就是征服土地以增進經濟、安全與其他利益；經由國家的行為拓展其影響力，以及掌控全球經濟或是至少施展一定的影響。^⑪在這場追求擴張的全球性競爭中，某個在政治上最有權力而且在經濟上最有效率的國家，就很自然地勝出成為霸權。^⑫故而對吉爾平而言，霸權的產生是全球競爭下的自然產物，而且這場全球競爭的冠軍僅有一位，也就是領先群倫的霸權，同時霸權運用其所擁有的資源及權力優勢地位，組建符合其利益的國際制度暨規範，提供包括國際建制、穩定的國際通貨及國際安全在內的國際公共財。^⑬麥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以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中的終極目標，是擴大該國在國際體系中所擁有的權力比例，最終理想是成為體系內的唯一霸權，^⑭亦就是取得國際體系中權力最高峰的地位。吉爾平雖承認霸權經由提供國際公共財、意識形態及價值，亦可能是霸權統治的正當性來源，不過他強調這些取得正當性的因素均非常薄弱或是根本不存在；他以為霸權的優勢權力，才是霸權統治的主要正當性來源。^⑮現實主義對霸權的討論，開啓吾人對國際體系層級結構的初步認識，而且現實主義認為霸權主宰他國的

註⑩ 有關依賴理論請參考，James A. Caporaso, "Dependence, Dependency,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System: A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1 (1978), pp. 13-43 ; Raymond D. Duvall,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ia Theory: Notes Toward Precision of Concept and Argu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1 (1978), pp. 51-78 有關世界體系請參考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註⑪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3-24.

註⑫ *Ibid.*, p. 129.

註⑬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86-87.

註⑭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 2.

註⑮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34.

正當性，是建立在「以力服人」的基礎之上。

從維繫霸業的手段來解讀層級，是第二種分析層級的方向。新自由制度主義從權力分配出發，討論霸權所擁有的權力分配優勢，以及國際合作之間的關係，尤其偏重討論霸權如何超越權力資源的高低，利用國際制度維持其霸業的問題。基歐漢（Robert Keohane）就揭示，單純運用權力分配無法解釋霸權衰落與國際制度仍持續運作的矛盾。他更勾勒出霸權領導需要一定的國際正當性，因為成功的霸權領導，依賴某種型的非對稱合作；霸權扮演著一種獨特的地位，為其夥伴國提供領導，換取服從的回報；而霸權沒有其他國家一定程度之同意，不能制定與執行規則。^⑤

檢驗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國際關係互動，基歐漢批評霸權穩定論以為物質優勢能夠導致國際秩序穩定與有效領導的看法，認為霸權必須在制度上投入資源，以確保其偏好的規則能夠導引其他國家的行為。^⑥伊肯伯理（G. John Ikenberry）則著重霸權的國際統治手段，以為霸權秩序的觀點奠基於層級式的國際秩序，但是層級的創設與維持可能有多種不同的型式。^⑦他評論吉爾平對霸權統治與秩序的認識，反映了運用強制力宰制次等國的最極端看法，卻忽略霸權亦可能運用較少的強制力與較和善的方式，以更具互惠、共識與制度化的關係，建立其他種類的霸權統治模式。^⑧新自由制度主義以為霸權如果運用國際制度得當，可以降低統治從屬國與維持國際秩序的成本，霸權主導下的國際制度，會創造出一個難以掙脫的利益誘因，吸引從屬國支持霸權的統治地位。新自由制度主義對霸權與國際制度的討論，已開始碰觸到正當性在層級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

康氏（David C. Kang）從東亞與中國的特殊歷史發展入手，企圖以層級的分析手法解釋東亞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非抗衡式互動。^⑨康氏界定層級為：「一個國際關係的體系，該體系的組織，是圍繞著一個核心與主宰的強權，涉及對主宰國暨次等國家間對權利暨責任的共享期待。在此體系內的國家，具有一組根基於對國家行為偏好暨意圖資訊之持續更新的國家行為共享期待，以及歷史的共享經驗。此組共享經驗降低了安全困境。此外，體系內的主宰國被期待能協助維持體系的秩序，同時能夠審慎地運用其權力。當體系內其他國家謀圖此一角色時，將會促成體系的不穩定」。^⑩

康氏強調國際體系層級的重要性及獨特性，有限地觸及層級所蘊含的概念性因素。他以共享期待與歷史的共享經驗，解釋東亞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穩定互動秩序。不過康氏以共享期待與共享經驗作為變數，解釋核心強權與次等國家間地位暨角

註⑤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 46.

註⑥ *Ibid.*

註⑦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6.

註⑧ *Ibid.*, pp. 27-28.

註⑨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7-85.

註⑩ David C. Kang,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3 (2004), p. 339.



色的成形，卻沒有說明權力如何在此種共享知識中被賦予意義，更沒有說明這些共享期待與經驗是如何生成。康氏企圖跳脫出權力分配因素的束縛，卻忽略權力資源分配在層級建構過程中所具備的重要地位，跌落到以文化概念分析層級體系變革的陷阱，將霸權的地位建築於歷史經驗與文化之上，卻未能深入解釋這種地位得以建構與維繫的具體因果性原因。康氏對國際層級的討論，固然跨出新的方向，卻並未如社會建構主義學者一般，探索這些共享經驗的建構過程。

第三種對層級的分析方向，是結合物質權力分配與社會權威分佈，討論霸權權威在國際層級的社會化過程，分析權力資源轉換為服從霸權統治之權威規範的建構過程，強調國際行為者在國際層級中的地位與角色，進而解釋國家間從屬關係的建構與瓦解。^⑳

社會建構主義解釋國際體系層級，是一種權威性的上位暨從屬關係，^㉑它意謂在國際體系中的兩個（或多個）行為者，其中一者處於發號施令（command）的地位，其他行為者服從指揮者，同時參與此種關係的各個行為者，都承認此種關係是正確同時是正當的（right and legitimate）。^㉒層級是一種分層化的社會安排，在層級中，存在權力與榮譽的秩序，而且社會是依據從屬的等級而分類。^㉓

國際體系中的層級結構，涉及行為者權力資源分配的不對稱、國際權威地位的高低、行使國際權利的不對等以及主導國際規範運作能力的失衡。層級結構的第一個特徵，是國際體系的行為者間存在不對稱的權力分配狀態，某一個國家擁有大部份的權力資源，而其他國家與該國存在極大的權力差距。國際關係中有關霸權的討論，都強調霸權所擁有的權力資源優勢。^㉔權力轉移論是從權力資源不對稱集中的角度，討論國際層級結構的代表。權力轉移論以為，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是不均等的，而且權力集中於少數國家的手中，故而國家間權力分配的差距，造成國際體系的層級結構。^㉕在一個層級的國際體系中，位居權力分配金字塔頂端的是主宰國（dominant nation），它擁有國際體系內最大部份的資源，維持相對潛在對手的權力優勢，以及運用可造福盟國並滿足其他傾慕國的規則，管理國際體系，以長保其權力的

註 ⑳ Ross Hutchings, "Empire and the State: A Critical Theoretical Assess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0, No. 3 (2006), p. 436.

註 ㉑ Jack Donnelly, "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43.

註 ㉒ John M. Hobson and J. C. Sharman,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s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 (2005), pp. 69~70.

註 ㉓ Ian Clark, *The Hierarchy of State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

註 ㉔ See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註 ㉕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p. 6;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172.

優勢地位，不過主宰國不能單向地控制其他強國的行爲。^㉗在主宰國之下是強權國家 (great powers)，強權國家擁有可觀的權力，但較主宰國遜色，如果強權國家滿足於國際體系的現狀，則成爲維持國際體系的助手；若某一強權國家對現狀不滿而且擁有主宰國 80% 以上的權力，則可能成爲挑戰主宰國地位的潛在競爭者。^㉘當然，這種物質權力的優勢，暗示霸權可以運用優勢權力資源，塑造全球利益的分配到一個有利於霸權的形態；同時霸權亦可以強迫從屬國分擔霸權的統治成本，甚至掠奪從屬國的資源。^㉙不過霸權亦可能自我限縮運用優勢權力資源的自由，換取一個長期穩定而且可以預期的國際秩序。^㉚

層級結構第二項特徵，是相對國家間存在的從屬及支配性權威關係，進而形成層級秩序的高度穩定性。相對國家在安全互動中存在層級關係時，主宰的一方固然擁有相對的權力優勢，主宰國更會運用其權力去操縱從屬國，故而從屬國不單是失去了自主 (autonomy)，更失去了自主的權利 (right to autonomy)。^㉛經由主宰國與從屬國之間的制度性安排，例如主宰國與從屬國之間，透過條約、規範及共享意識形態所展示出十分穩定的相互主觀諒解 (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s)，確定了彼此的行爲期待；^㉜透過國家安全事務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的制度化，產生了安全的功能性分化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這種安全分工並不僅限於兩造對安全之內容款目 (provision) 的分工，更因爲主宰國決定何者是從屬國的安全威脅，主導了從屬國的安全認知，使得從屬國依附於主宰國，而且受到主宰國的影響。^㉝所以國家間的層級關係並不一定會出現大國軍事干預從屬國的現象；相反地，主宰國與從屬國之間的層級關係，產生了賦予主宰國支配從屬國的正當性權威。^㉞這種上下從屬的權威關係，形成層級結構秩序的高度穩定性。

層級結構的第三項特徵，是國家間行使國際權利的不對等。主權是國際法暨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基礎，不過在國際實踐中，長期存在國家間不均等地行使主權暨國際權利的事實。現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主權受限的情況，已被視爲當然而且正當，例如

註 ㉗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 6.

註 ㉘ *Ibid.*, pp. 6~7.

註 ㉙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1985), pp. 587~588.

註 ㉚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 53.

註 ㉛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p. 697.

註 ㉜ *Ibid.*, p. 690.

註 ㉝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p. 698;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4 (2004), p. 613.

註 ㉞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pp. 690, 700.



歐盟參與國的國家主權，都受到歐盟制度的限制。^④具有部份主權的半主權國家，在近世亦不少見。例如十九世紀前的宗主國與藩屬國、保護國與被保護國關係，加拿大與澳洲往昔作為大英帝國之自治領，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暨國際權利之行使都受到諸多限制。在保護國與被保護國的關係中，弱國與強權國家簽訂條約，弱國自願受到強權之保護，將其對外事務之權利，讓予強權國家，自願放棄其涉外權利。^⑤位列藩屬或被保護地位的國家，處於國際層級結構的底端，對外交往等國際權利，是由其他大國所代為行使。

最後，層級結構存在國家運用暨主導國際規範的差異性。國際制度暨國際規範並不是對所有的國家都具備同等的拘束力，創建國際制度的領導國，對國際制度的運用能力及效益，顯然高於其他後進國家；在同樣的國際制度運作規範下，核心國家較邊陲國家在相同的投入下，享有高的收益，更強化了彼此原本不對稱的地位。^⑥以國際法的發展為例，位處高層的主宰國，制度化有利於己的國際法規範，成為某些國際法發展的推手；但是對不利於霸權地位的國際法發展，不是規避該種規範的拘束，就是抗拒此種國際法的多邊法制化過程。^⑦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是一個制度化強權特殊地位的範例，該制度確定列強主導國際社會運作的合法正當性，認為大國具有特殊的權利與手段，可以在穩定國際局勢的名目下，決定體系內弱勢行為者的前途與地位。歐洲協調制度下的列強，在擁有國際社會中最大部份的權力之餘，更被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認可，具有使用此種優勢，決定國際社會走向，以及決定爾後權力分配的權利與特殊地位。^⑧運用國際認可，賦予列強特殊地位的設計，亦先後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與聯合國（United Nations）所延續。國際社會已進入 21 世紀，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設計，仍反映了此種國家間地位與國際權利暨義務不對稱的事實，而且大部份國家均接受此種差異性。

肆、國際層級的建構

層級是一種國家間權威性的上下從屬關係，它不單呈現出國際體系行為者權力的不對稱，更牽涉到彼此角色認定、認同差異暨行為趨向的建構，這些因素隨著國際權力分配與觀念分配的變化而有不同的面貌。故而層級並不是單純地物質力量分配的結

註^④ Simon Collard-Wexler, "Integration under Anarchy: Neorealis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3 (2006), pp. 397-432.

註^⑤ 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8th edition. 2 volumes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1955), p. 192.

註^⑥ Johan Galtun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8, No. 2 (1971), pp. 87-89.

註^⑦ Nico Krisch,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 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No. 3 (2005), pp. 381-389.

註^⑧ 陳欣之，「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一個國際安全合作制度的孕育、持續與改變」，*政治學報*，第 37 期（2004 年），頁 145。

果，而是國際物質權力分配與國際觀念分配互構下的產物。國家間的權力關係在國際體系中轉換為權威關係，經由權威規範的內化過程，建構新的國家認同與角色，將國際體系行為者的統治基礎，從權力優勢演變為治理權威。由於霸權支配國際體系的地位與行為被視為正當，故而霸權在層級中地位亦更顯得穩固。相反地，如果霸權無法將「以力服人」的統治基礎，轉化為改變對手統治菁英實質信念，促使其接受霸權的世界觀與價值標準，^⑩進而形成「以德服人」的治理權威，^⑪霸權的統治成本將會明顯提高。

不對稱物質力量的分配，創造了層級結構得以建構的基礎；討論物質權力資源分配的霸權穩定論與權力轉移論，開啓了國際關係理論對層級的初步討論。不過它們僅單純討論國際體系內權力資源分配不對稱所造成的差距，以及位處權力資源分配金字塔頂的霸權，所面臨的霸權更迭挑戰，並沒有討論到權力資源分配不對稱結構內的觀念分配情況，以及此種結構的建構過程與內在關係。單純評量權力資源的多寡，更難對英美霸權地位的和平轉換提出合理的解釋。不過觀察霸權在國際體系內權威地位的起落，將可以開啓另一個新的解析途徑。^⑫

韋伯 (Max Weber) 界定權威是一種施展權力並得到服從的特殊型式，他認為權威 (herrschaft) 是一群人會服從某些特定的 (或所有的) 命令的可能性，^⑬所謂權威或支配可能會基於不同的服從動機，從最單純的習慣性服從至最純粹理性的利益計算，因此每一種真正的支配形式，都包含著最起碼的自願服從之成份。^⑭由此出發，權威是一種相互承認的規範性關係，此種關係給予某方支配或是發言 (command or speak) 的權利，同時其他行為者有遵從的義務，故而權威成為某種影響力的型式，僅能在一個

註⑩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1990), p. 285.

註⑪ 必須要強調的是，「以德服人」的「德」，在本文是指國際制度運作所建構的規範，進而衍生出的一種統治權威，它並不是「道德」的同義詞。有關「以德服人」統治權威的討論，可以參考「善意霸權」(benign hegemony) 的概念，請參考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1998), pp. 40~79.

註⑫ 權威雖廣為國內政治所運用暨討論，但是國際學術界運用權威概念進行國際關係之研究亦非特例，美國研究國內政治的學者在 1970 年代即認為權威概念對整合研究有很大幫助，請參考 Harry Eckstein, "Authority Patterns: A Structural Basis for Political Inqui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No. 4 (1973), pp. 1157~1158. 有關國際關係學界討論權威概念的果，可參考 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icholas Onuf and Frank F. Klink, "Anarchy, Authority, Rule;"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2002); A. Claire Cutler, *Private Power and Global Authority: Transnational Merchant Law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⑬ 德文之 herrschaft 可譯為英文之 authority 或 dominance，在討論韋伯的觀點時，中文學界將此一字詞譯為權威、支配或是統治。請參考韋伯 (Max Weber)，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 (上下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238；韋伯 (Max Weber)，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 (III)* (台北市：遠流出版社，1996 年二版)，頁 1~2。

註⑭ 韋伯 (Max Weber)，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 (上下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238。



由各方接受的某種規範性安排中，才能夠施展。^⑤權威關係不是統治與服從的實然關係，而是「統治的權利」與「服從的義務」所構成的規範性關係（*normative relation*）。^⑥若一群個體願意無條件地服從，是基於其共享信念，認為上位者加諸其意願到這一群個體是正當的，而且他們的拒絕服從是不正當的，就是權威。^⑦

故而權威是一種社會建構下的規範性關係。權威的施展要滿足幾個要件：首先，權威是社會各造所共同建構的一種互動關係，彼此建構出明確的角色與地位，而且此種角色與地位，是為各方所共同認知；其次，權威關係中的角色與地位，具有上下支配的特徵，有一方是處於支配或是統治的地位，而其他各方承認此種支配或是統治地位，同時認定自身是處於一個服從的地位；當然，位處支配地位的統治者，亦認知到此種上下支配地位；第三，權威是一個為各造接受的規範性安排，此種規範的存在與內容，為各方所承認及接受，也就是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最後，接受或是承認權威關係的安排，代表存在某種形式的影響力，不單是某方對他者施展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亦同時承認或是接受某方擁有對他者具有施展此種特殊影響力的安排。^⑧所以在權威關係中，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信念（*beliefs*），其一信念是某方具備統治名位；其二是統治者支配或陳述內容正確性的信念。^⑨這兩種不同層次的信念，亦建構了兩種不同的權威。信仰某方具備統治名位，就根本不會質疑權威統治的命令與言語內容，形成盲目的服從或是無條件的服從。^⑩如果信仰統治者支配或陳述內容的正確性，受支配者或許會思考統治者命令的內容，但是其推理的結論，都會指向服從權威統治者命令，受支配者反而失去了理性思辨的能力。這兩種情況，都顯示被統治者失去了自我，支配者完全掌控了被統治者的認同與身份建構。

簡單地說，權威就是權力的正當性運用（*legitimate exercise*）。^⑪此種定義下所謂的正當，並不見得是公平或是正義的同義詞，或國際體系是否符公平或正義標準的陳述，而是行為者共同接受某一種信念的程度，^⑫故而在某個時期被認為具備正當運用權力的權威，在某個時期可能被視為離經叛道，例如十九世紀的殖民統治，在二十世紀就被視為一種壓迫的型式，而難為國際體系的行為者所接受。

韋伯曾列出三種權威型式，分別是傳統型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卡理斯瑪型權威（*charisma*）與法律理性型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⑬在國際體系中，傳統

註^⑤ R. B. Friedman,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seph Raz, ed., *Author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9.

註^⑥ 謝世民，「政治權力、政治權威與政治義務」，*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1期（2002年），頁14。

註^⑦ Peter M. Blau, "Critical Remarks on Weber's Theory of Author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7, No. 2 (1963), p. 307.

註^⑧ R. B. Friedman,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 69.

註^⑨ *Ibid.*, p. 68.

註^⑩ *Ibid.*, p. 72.

註^⑪ Nicholas Onuf and Frank F. Klink, "Anarchy, Authority, Rule," pp. 166~167.

註^⑫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a Glob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S1 (2003), p. 84

註^⑬ 請參考韋伯（Max Weber），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頁241~274；韋伯（Max Weber），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

型權威乃是基於傳統或是歷史的經驗，所建構出一種權威關係，例如朝鮮半島國家對中國的長期順服，以及殖民母國對脫離殖民獨立國家的影響力。卡理斯瑪型權威則源於對某一種特定國家特質的敬仰暨熱愛，建構了該國所具備的權威地位，例如美國所代表的開放社會暨民主價值，都強化了他國對美國權威領導地位的順從。最後，國際制度與全球治理，代表著法律理性型權威在國際社會的實踐，國家服膺某種超國家或是跨國性國際制度的約束。

每一個支配系統都企圖培養及開發其「正當性」，^④國際體系中的霸權亦不例外。霸權社會化從屬國的價值與規範，建構權威關係的管道有二：分別是雙邊與多邊管道。雙邊管道是指霸權與個別從屬國間的直接接觸，例如透過外交交涉、軍事互動、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等。社會化國際權威規範的多邊管道，主要是透過國際制度。國際制度不單是社會化的場域，更是社會化的推動者，國際制度首先就蘊含著便利霸權全球秩序擴張的規則；其次，國際制度本身就是霸權際秩序的產物；第三，國際制度在意識形態上正當化了國際秩序的規範；第四，國際制度吸納了來自邊陲國家的菁英；最後，國際制度吸收了反霸權的觀念。^⑤享有權力優勢國家的統治地位，經由國際制度被賦予正當性，進而統治者的所有行為，亦被視為該種統治地位的正當權力施展，從而建構出上下從屬的權威關係。^⑥經由國際制度的內化作用（internalization），國家形成新的國際社會角色，或是改變了原有的價值或是利益。^⑦

霸權社會化權威規範，可透過外在誘導（external inducement）、內在重建（internal reconstruction）與規範勸服（normative persuasion）等方式，內化國際體系成員，具備特定的價值與規範。^⑧外在誘導是指霸權運用權力資源優勢，對從屬國施加物質或是社會性的獎懲，改變國家的行為誘因，經國際體系成員採理性的策略權衡（strategic calculation）後，採取符合霸權期待的行為。此種方式經由多次的實踐後，將改變從屬國的規範與價值，產生正當化權霸之權力施展的作用。內在重建是霸權直

註④ 韋伯（Max Weber），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頁3。

註⑤ Robert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in Gill Stephen,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2-64.

註⑥ 國際關係學界針對霸權掌控國際制度或是享有絕大影響力的研究發現已非異數：有關霸權掌控國際法之研究，請參考 Michael Byers,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Nico Krisch,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 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有關強權控制國際制度之文獻，請參考 Robert W. Cox and Harold K. Jacobson,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Lloyd Gruber, *Ruling the World: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Richard H. Steinberg,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pp. 339-374.

註⑦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806-808.

註⑧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pp. 290-292.



接干預並改變從屬國的內部制度，通常發生於霸權直接征服或統治從屬國的情況，屬於一種霸權強迫從屬國接受特定價值與規範的過程。規範勸服是透過多邊的國際制度與雙邊互動，將霸權的價值與規範，內化為從屬國的規範與價值，進而促使從屬國在擬訂政策與行為之前，就在認可霸權統治權威規範的牽引下，做出符合霸權利益的行為反應。規範勸說的內化效果，比外在誘導產生更持久的效力，不過外在誘導與內在重建兩種手段，較易啟動國際社會化的作用。^⑩此外，國家間接觸與互動的頻率及強度，成為另一個決定層級架構的重要指標。如果接觸的次數頻繁，權威關係社會化的作用亦會較強；倘若接觸頻率及強度非常微弱，很難期待會產生規範社會化後的長期效果。

層級架構的鬆動，除了需考慮霸權與從屬國之間物質權力資源不對稱差距的強度，國際社會化權威關係的功效強弱，也不容忽略。相對享有權力資源優勢的國家，與其他相對弱小國家在國際體系內進行互動時，自然享有較多的社會化工具優勢。相較之下，當一個弱國面對主張建立國際制度的霸權，由於權力的作用，弱國被迫放棄對其最有利的一個決策選項，而去採納一個對霸權最有利的選項。^⑪權力優勢國家在建構權威關係的國際社會化過程中，擁有較多的機會暨資源，足以施加獎懲來左右對手國的行爲，改變對手國的利益偏好，設定策略權衡的走向，或是建構有利於霸權國家利益的國際制度，勸服或是改變對手國的國際角色，建構並且正當化彼此的上下支配與服從地位，進而長期穩定國際體系中的層級結構。當然，如果某國長期積弱不振，或是國家權力資源每下愈況，相對於霸權的從屬性地位亦會隨著國際互動而日趨堅實。另一方面，國際體系內的霸權地位，未必會隨著該國擁有權力資源的相對衰減而巨幅滑落，甚至受限於被視為正當的服從規範，從屬國挑戰霸權支配地位的動機，亦會因而躊躇不前。

伍、多極與兩極中的國際層級

國際體系層級的建構，會隨著體系內權力資源分配的集中程度與權威的強弱，而有不同的面貌。基本上，國際體系的層級，是由不同地位國家所組成的一個金字塔狀的權力暨地位分佈。在全球層次，固然可能發生國家地位的層級式支配與服從關係，在區域內更不能排除發生層級關係的可能性。觀察過往的人類互動歷史，受限於地理及科技，不同的地理區塊內都曾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層級結構，如東亞的中華帝國、南亞的印度帝國、中東的帝國興替與西歐地區的權力平衡經驗。進入十九世紀後，隨著西歐國家競爭場域的全球化與激烈化，開始產生具有全球意義的層級結構。

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內，存在不同規模的層級。依據國際體系物質權力的分配程度暨權威關係的密度，可以整理出國際體系層級的各種類型。物質權力分配指

註⑩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pp. 806~813;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p. 314.

註⑪ 陳欣之，「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政治學報，第40期（2006年），頁129。

的是國際體系中大部份物質權力資源集中於三國以上、兩國或是主要集中於單一國家的狀態，吾人通常稱之為多極、兩極與單極。^①權威關係密度，則是從屬國接納權威規範的社會化效果，反映於從屬者對權威信念的順從（compliance），以及主宰國是否亦受到反映此種權威規範之國際制度的束縛。^②當從屬國對權威規範抱持高度的信念，同時在不同領域都有相應的國際制度反映此種權威規範，但是主宰國享有獨立於權威規範拘束之外的地位，則產生權威關係高密度的結果。如果國際體系成員對權威規範的信念並不濃厚，僅在某些領域之雙邊制度反映權威規範，而且主宰國行為亦被反映此種權威規範的國際制度所影響，則被歸類為低度權威關係密度。倘若權威規範透過國際社會化被體系中的從屬國所接納，但是主宰國的行為亦受到反映此種權威規範的國際制度所束縛，則稱之為中等密度的權威關係。

運用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與權威關係密度作為評比項目，吾人可以概略地將國際層級結構分為無層級的原始狀態、鼎立附庸、大國協調、兩極鬆散、兩雄扈從、制度兩霸、朝貢體系、單極順服與全球帝國等不同的類型。

附表 國際體系層級的類型

權威關係密度 權力分配	高	中	低
多極	大國協調	鼎立附庸	原始狀態（無層級）
兩極	制度兩霸	兩雄扈從	兩極鬆散
單極	全球帝國	單極順服	朝貢體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層級權威規範密度微弱的多極體系內，所呈現的是霍布斯式無政府原始狀態（Hobbesian Anarchy），基本上不存在層級結構。在此種純粹而且沒有層級現象的原始無政府狀態中，國際體系行為者之間互不從屬，各自為了生存而相互競爭。在這種無層級的原始狀態中，不同的國家之間互為敵人，國家之間互不承認他國的生存權及獨立，戰爭是一種常態，為了本國的生存與安全，攻擊他國或是消滅他國不受到任何規範或法理的限制。這種原始狀態，反映了新現實主義所描述的國際政治無政府本質及國家自助的環境。國家互為敵對的狀態，使得生存及安全成為最高的考量，每個行為者使用一切手段增長軍事實力，以取得相對於他國的軍事優勢，並且最大化地追求國

註① 請參考 Jeffrey Hart,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No. 2 (1976), pp. 289-305.

註② 權威關係密度的核心關鍵之一，在於從屬國對主宰國的順從程度。目前國際關係學界已發現從屬國對霸權主宰國的政治順從現象，請參考 Neil R. Richardson, "Political Compliance and U. S. Trade Domina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0, No. 4 (1976), pp. 1098-1109; Philip G. Roeder, "The Ties that Bind: Aid, Trade, and Political Compliance in 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9, No. 2 (1985), pp. 191-216. 但是測量順從程度的高低，仍未見投注必要的心力。本文有關國際層級類型之分類，仍屬於概念性的分析，尚有待開發精細的衡量方法以測度權威規範密度的高低。



家利益的實現。國家在自然狀態中更不可能會有合作及信任，一切都是權謀的利益計算，任何一國都有可能是吞併本國的敵人，國家數目隨著征伐而急劇改變，形成一種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狀態。^⑬無層級的無政府原始狀態內，沒有建構權威規範的雙邊或是多邊國際制度，權威規範更不是一個被認可的信念。無層級的原始狀態內，國家間的物質權力資源分配呈現分散的狀態，而且國家間亦不存在上下從屬的權威性規範。

無層級的原始狀態隨著行為者的征服與擴張而產生變化，隨著國家間上下從屬權威關係的初步建構，為了國家的生存與安全，行為者之間開始產生雙邊與多邊軍事聯盟制度，並且進而將權威關係擴散到政治領域，產生鼎立附庸類型的層級結構。相對於層級結構內的從屬國，這些多極列強，就是主宰從屬國地位與命運的霸權。

以中華文明的春秋戰國時代及西歐自十六世紀後的歷史經驗為例，體系中享有主要權力分配優勢的列強，在互不信任而且相互為敵的共享知識指引下，秉持國家主權獨立而且不受外力干涉的認同，組成雙邊或多邊軍事聯盟，相互對抗，進而產生鼎立附庸的狀態。對彼此實力相當的大國而言，彼此之間的互動是權力平衡的模式。在這種物質權力多極分配的鼎立附庸體系中，依附大國的弱國，他們沒有什麼轉換陣營的選擇，而且與主宰盟邦存在極大的權力資源劣勢。^⑭這些面對權力不對稱差距的小國，處於一個層級狀態的從屬地位。軍事聯盟內處於被支配地位的國家，受到主宰國的宰制，遊走於不同聯盟之間的機會十分有限，卻未能改變被支配而且服從聯盟主宰國的命運，甚至時時處於被聯盟主宰國拋棄（abandonment）的恐懼。^⑮聯盟內部的權力分配差距與地位差距，迫使從屬國的安全選項十分有限。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季文子就曾說：「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⑯正是說明小國在聯盟中所處的依附性地位，以及以扈從（bandwagon）為主的國家行為趨向，同時亦反映了聯盟內權威暨地位不對等的層級狀況。鼎立附庸式的國際體系層級關係，上下從屬性權威的制度化領域多限於軍事與政治領域，從屬國對權威規範的信念，是一種「弱國無外交」的無奈，反映霸權「以力服人」的宰制情況。在鼎立附庸式的層級狀態中，權威關係社會化日趨強化，雙邊與多邊軍事聯盟對從屬國家施加強烈的拘束力，即使主宰國亦不能免俗，受到「義」、「禮」、「榮譽」的束縛，甚至面臨被從屬盟邦構陷（entrapment）的可能。^⑰

當列強受到國際合作規範暨多邊管理概念的牽引，組成共同管理國際事務的大國協調制度，多極體系大國主宰從屬國的鼎立附庸類型亦隨之改變。在大國協調中，國際體系的物質權力資源雖然仍分散於數個主宰性大國，但這些強權與從屬國的權威關

註^⑬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51~266;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02~128.

註^⑭ Glenn M.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71~472.

註^⑮ *Ibid.*, p. 466.

註^⑯ 劉文淇,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香港: 太平書局, 1966年), 頁 845。

註^⑰ Glenn M.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 467.

係，隨著大國協制度的建立而具備高度的正當性。^⑧強權被賦予共同管理國際體系的角色，透過協商暨共同行動維持國際秩序以及國際層級結構的運作。值得注意的是，強權國家的地位並不是與所擁有的權力資源劃上等號。1815年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的實踐顯示，「強權」地位是一定權力資源與特別國際義務的結合體，強權要肩負維持國際體系穩定與秩序的重擔；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及當時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控制的領土與人口均相當或是超過普魯士暨奧地利，卻未能成為歐洲協調的締造者，更未能參與歐洲秩序的重建過程。^⑨透過大國協調的程序，強權建立行為的規則，這些被賦予正當性的行為，產生權威的效果，強權國家得以共同支配從屬國的行為，處理從屬國的疆域變更，以及干預從屬國內部政治事務的發展。^⑩從屬國接受這種層級關係的安排，並非完全是國際體系內力不如人的屈從，從屬國政治菁英間有關建構大國協調制度的共享性認同，亦是從屬國安於接受次等地位的一項重要因素。

在大國協調的層級類型中，權威關係規範開始反映在政治、軍事與文化領域的國際制度，從屬國的政治菁英深深浸淫於此種權威規範內，產生權威規範高度社會化的效果。但是位居強權的大國，卻完全可以改變權威規範的內容，享有興革國際規範卻不必受國際規範左右的地位。例如歐洲協調時期，列強對軍事干預從屬國內政的時機與理由，完全是依照列強的利益而決定，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則。甚至強權政治菁英一旦失去了進行大國合作的信心與意願，強權的合作統治亦立即無以為繼，^⑪大國協調式的層級模式中，從屬國受制於強權合作統治的拘束，不過主導世局的強權，卻擁有隨時可依其利益變動國際規範的地位。

物質權力資源集中於兩個大國的兩極體系，層級結構呈現出兩極鬆散、兩雄扈從、制度兩霸等不同的面貌。最極端的兩極權力分配體系，是一個僅存在兩個國家的國際體系，如果國際兩極體系內的國家行為者超過兩者以上，但是從屬國對主宰國的權威信念並不強烈，而且反映權威規範的國際制度對主宰國的行為亦施以強大的影響，則構成兩極鬆散的國際層級。在此種層級架構中，其他一般國家並不服從兩極國家，即使是加入兩極聯盟的國家，亦可以透過聯盟制度影響主宰國的行為，使主宰國在軍事聯盟陷入被構陷的陷阱。^⑫

但是兩極鬆散式的國際層級結構，其存在的可能性很低。因為位處兩極的強權，有很高的動機去維持霸權的地位，更會採取措施，預防對手擴大其勢力範圍的可能

註^⑧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p. 98~100.

註^⑨ 陳欣之，「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一個國際安全合作制度的孕育、持續與改變」，頁132~133。

註^⑩ René Albrecht-Carrié, *The Concert of Europe*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1968), p. 53; Richard B. Elro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2 (1976), pp. 163~167.

註^⑪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84.

註^⑫ Glenn M.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 484.



性。權力暨地位相對弱勢的一般國家，在兩極體系內將被迫面臨「選邊站」的壓力；一旦加入某一集團後，從屬國企圖變換陣營根本是一個幻想，因為他們失去背盟的動機，更缺乏對抗盟主脫離聯盟的能力。^③在這種情形下，扈從成爲一般國家所不得不然的策略。^④由於弱國在兩極對抗的國際體系中不具備決定最終結局的能力及地位，在兩極體系內，某一強權的整體能力愈強，其他國家向其靠攏的可能性愈高，^⑤因爲在僅有兩大強權的國際生存競爭中，如果加入力量較弱的一方，無異投身命定失敗的一邊；相較之下，加入權力較有勝算的一方，更能保障本國的生存及利益，所以弱國會具有高度的扈從傾向。弱國對霸權的扈從是一種不對等的交換，弱國對霸權作出不對稱的讓步，並且接受一個臣服的角色。^⑥這些因爲太過弱小或是因爲恐懼而加入霸權陣營的小國，更被稱爲走狗國家（Jackal states），^⑦反映了弱國在聯盟中所處的從屬性地位，以及接受霸權領導權威的事實，更削弱了兩極鬆散層級結構持續存在的可能性。

兩極權力分配局面一旦持續下去，霸權會逐步強化陣營內的層級權威關係，最後產生兩雄扈從式的層級結構。有鑑於霸權「以力服人」的統治代價畢竟太高，兩極集團的霸權開始尋求建立反映權威規範的制度，以穩固霸權在兩極權力分配中的既有權力地位，並且降低霸權掌控自我陣營內的統治成本。在此過程中，霸權與從屬國，開始建立穩固的雙邊軍事暨政治盟約制度，上下從屬的權威關係開始逐步爲從屬國所信服與接受，形成兩雄扈從的層級類型。兩雄扈從的層級類型，亦反映在兩極霸權開始運用多邊的國際制度，社會化對霸權統治地位抱持疑慮的一般國家。在此階段中，權威關係主要仍發生於軍事暨政治的雙邊制度，主宰國還是受限於國際制度的束縛，不過從屬國扈從兩極霸權的規範信念開始有所變化，從力不如人的無奈，趨向收受霸權提供的公共財、接受霸權的領導地位。霸權則自制運用權力，自願受到國際制度的拘束，換取從屬國的支持。^⑧霸權在各自陣營內開始社會化權威性的上下從屬規範，同時其統治地位亦隨著國際制度的次第建立與運作而日趨穩固，形成「以德服人」的霸權統治方式。

國際層級在兩極體系的最高階段，是形成制度兩霸式的層級結構。1980年代後的美國與蘇聯，在個別陣營建立橫跨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的各種國際制度，都進入成熟運作的階段，發揮社會化權威關係的重要作用，從屬國開始展現對霸權統治的高度支持。在制度兩霸層級類型中，霸權運用其優勢經濟資源爲主的權力，透過國際制

註^③ *Ibid.*

註^④ 請參考 Kevin Sweeney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2004), p. 44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163.

註^⑤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註^⑥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in Southwest Asia: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in Cold War Competition," 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5.

註^⑦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69.

註^⑧ 請參考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度的創設，滿足與實現其利益，並鞏固其優勢的霸權地位。^⑧霸權在個別的陣營內，設立統御其他從屬國的軍事、經濟暨政治制度，強化霸權在這些陣營中的權威地位；例如美國所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與蘇聯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這些兩極霸權國家成為從屬國軍事安全的保護者，政治制度的典範，更為從屬國提供經濟的原料暨市場，成為維繫該陣營經濟活動的主要推手，而兩極霸權國則取得支配從屬國的正當性權威。^⑨

制度兩霸層級結構內的霸權，建立政治、軍事、經貿與文化等各種領域的國際多邊制度，除了得到更多有關利益、偏好及其他國家意圖的資訊，這些多邊制度，更為霸權提供不同政策選項的成本效益，改變國家手中擁有的權力資源之強度，並且影響主宰制度運作的規範。^⑩霸權與從屬國之間的合作，成為霸權自助的一種手段類型，因為合作是霸權遂行統治的最佳行為選項，^⑪而建立國際合作機制可以大幅降低霸權維繫其層級主宰地位的統治成本。經由國際制度的作用，霸權不但可以維持體系的秩序與穩定，還可以長期確保霸權在層級結構中權力分配的優勢地位，更可以降低決策時的不確定性。被納入霸權主導國際制度的從屬國，或許會抱怨霸權的某些作為，但是為了本身的利益以及國際制度報酬遞增的效果，迫使從屬國接受現有的制度運作，而不會去撕裂霸權主導的國際制度。^⑫國際制度領域的拓展，強化了霸權統治權威的正當性，更經權威規範的制度化作用，改變從屬國的利益偏好及設定，穩固從屬國對霸權統治權威的信念；但是霸權國左右國際規範的能力亦日趨強化，透過主導國際規範議程與塑造其他國家偏好，制度兩霸層級結構中的主宰國，取得主導制度的特殊地位。^⑬蘇聯集團的崩毀是一個很有趣的反面例證，蘇聯統治東歐國家的統治成本一直很高，再者受限於蘇聯經濟日趨衰敗的困境，最後蘇聯放棄身為層級結構中的霸權統治地位，放任東歐國家脫離此一層級結構，^⑭蘇聯一手促成蘇聯集團層級結構的解體。東歐集團的變化顯示，在主宰國失去主導的意圖後，依附國亦因而失去順服的對象，進而終止了國際制度社會化統治權威的作用。同時層級結構消失的關鍵，是上層主宰國的相對權力地位與意願，而非從下而上的解體。事實上，這些東歐國家隨後又自願地加

註^⑧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139.

註^⑨ Alexander Wendt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pp. 689~721; David A. Lake,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5.

註^⑩ Helega Haftendorn, et al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

註^⑪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3 (1994), p. 53.

註^⑫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1999), pp. 71~76.

註^⑬ Richard H. Steinberg,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pp. 339~374.

註^⑭ 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1994), p. 262.



入了歐盟的層級結構。⁹⁶

陸、單極體系中的國際層級

國際物質權力資源分配集中於單一國家的單極體系，並不代表獨霸國的統治成本就會相對較低，更不代表獨霸國的統治正當性獲得普遍的認同，甚至單極的權力資源分配狀態，更不是獨霸國將宰制全球的同義字。依據權威規範的密度，單極體系可以分為朝貢體系、單極順服與全球帝國等三種國際層級類型。

從屬國向主宰國提供貢品，作為政治順服的象徵，自遠古時代就行之有年，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無疑是中華文明所建立的朝貢體系。華夏帝國在東亞所擁有的權力資源優勢，是朝貢體系的建立基礎。朝貢體系的意識形態根源，是中華儒家文化中的禮治及秩序思想，華夏統治者以為統治的正當性來自於道德的優劣，具有高度文明的中華帝國，自然享有當然的統治地位，而其他國家在中華文化圈以及東亞國際政治中的地位，是以接受中華文化的同化程度而決定，是一種以中國為核心的層級式世界觀。⁹⁷朝貢體系更透過一套繁瑣細緻的朝貢儀式及典章規範，強化並彰顯朝貢國與中國之間的政治從屬關係。⁹⁸當然，這種一廂情願的規範，是否能夠經由互動的國際社會化，內化其他與中國接觸的國家，同時產生持續性的作用，就是朝貢式層級權威關係能否長期運作的關鍵。

檢視清代的朝貢關係發現，這種朝貢體系的層級權威關係，無論國際社會化的深度與反映此種權威關係制度的廣度，都十分有限。首先，與清朝建立正式朝貢關係的國家數目僅有七個，而且長期保持穩定的朝貢關係者只有三個，就是朝鮮、安南與琉球，⁹⁹其中琉球還同時向清朝與日本薩摩藩朝貢，¹⁰⁰東南亞國家絕大多數並不表現或是理解中國作為上位的從屬關係；¹⁰¹其次，中國並沒有將朝貢體系發展為多邊的國際制度，朝貢制度的主要運作對象與方式，是清朝與安南暨朝鮮的雙邊關係。安南與朝鮮在文化、政治制度、戰略與經濟上受到中國深厚的影響，甚至發展出認同朝貢制度的國際社會化現象。安南一方面尊奉中國為「上國」，承認本國處於較低的文化及政治地

註⁹⁶ 歐盟被視為一個準層級秩序的超國家組織，請參考 Simond Collard-Wexler, "Integration Under Anarchy: Neorealis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p. 406~410.

註⁹⁷ Lien-sheng Yang (楊聯陞),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22.

註⁹⁸ 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p. 36~46.

註⁹⁹ 祁美琴，「對清代朝貢體制地位的再認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6卷第1期（2006年），頁52。

註¹⁰⁰ Robert K. Sakai, "The Ryukyu (Liu-Ch'iu) Islands as A Fief of Satsuma,"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p. 112~134.

註¹⁰¹ 莊國土，「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南洋問題研究*，總第123期（2005年第3期），頁1~8。

位，但轉而稱柬埔寨為「蠻夷」，^⑩自認位居較高的文化地位。不過這種為朝鮮暨安南所認同的權威關係，顯然並沒有為其他國家所依循；第三，中國並不積極運用外在誘導與內在重建的社會化手段，推展朝貢的從屬權威關係，而且除了朝鮮之外，更沒有發現規範勸說的長期社會化效果。中國沒有使用武力將所有東亞國家納入從屬中國的朝貢體系，而且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武力征討效果都很有有限，既沒有納為直屬領土，也沒有直接干預這些國家的內部政治制度，更沒有透過軍事力量保護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利益。最後，朝貢制度甚至包含著濃厚的貿易成份，^⑪成為外國商人在中國進行貨品交換的政治通行證。

朝貢體系雖然是奠基於單極主宰擁有物質權力資源優勢的基礎，不過主宰國缺乏深化此種權威關係的意願，僅滿足於從屬國的表面尊敬。朝貢體系是一種建築在自我中心的「共存」態度，^⑫似乎不追求領土暨勢力範圍的擴張，朝貢國自我可以決定是否接受單極優勢國家的統治地位，而且被統治者亦可以隨時退出統治者的勢力範圍，而僅受到很有限的懲罰。中華帝國則深受此種朝貢式規範的影響，要求來到中國的外國人士遵守朝貢禮儀，受到外力衝擊時，固守「夷夏之防」的清朝，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朝貢體系式的層級結構中，享有物質權力資源集中優勢的國家，雖會鞏固地緣上的勢力範圍，建立穩固的權威式上下從屬關係，但對於威脅性甚微的國家，可能會採取放任的態度。

單極順服式的層級結構則是另一番光景。單極主宰國在單極順服體系內享有絕對優勢的相對權力地位與難以挑戰的軍事優勢，單極順服體系內更不存在改變現狀國家所組成的軍事聯盟。除此之外，全球依賴單極主宰國所提供的資金、技術與市場，作為穩定全球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動力。單極主宰國的政治制度、文化生活方式與意識形態，都是塑造全球普世價值的典範，具有他國難及的軟權力作用。^⑬單極主宰國利用國際制度等各種軟權力，以及全球技術研發核心的地位，創造了將知識轉化為權力的權威地位，強化單極主宰國獨佔鰲頭的權威性支配基礎。^⑭在全球化的聲浪中，從屬國完全失去了與單極主宰國保持距離的權利與自由，被迫與單極主宰國發生接觸互動，無論是國家的主權地位、文化獨特性與經濟自主性，都感受到獨霸國優勢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刺激。

當然單極順服層級結構絕非單向的建構過程，雖然單極主宰國享有超越其他國家更多而且更大的行動自由，單極主宰國仍然受到國際權威規範的一定拘束。觀察 90 年代的美國可以發現，即使主宰國在單極體系內享有一定的國際權威地位，不過其領導

註⑩ 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p. 68.

註⑪ 請參考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濱下武志，朱蔭貴、歐陽菲、虞和平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制度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29~51。

註⑫ Yongjin Zhang,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01), pp. 43~63.

註⑬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p. 69.

註⑭ 陳欣之，「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頁128~134。



地位及行爲，仍受到反映此種國際規範之國際制度的影響。美國所領導的國際制度，正當化了美國所處的支配地位與其他國家所處的不平等角色，而且這些特殊地位均透過國際制度與國際法的方式，爲國際體系的行爲者所接受。^⑩例如聯合國憲章中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所擁有的否決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不等值國際金融地位；禁止核子武器擴散制度允許某些國家擁有核武，而其他參與國放棄擁有核武的權利等等，均爲霸權優勢地位法制化後的結果，而且國際法亦容許此種情況的存在。不過美國未能單方面地更動這些規則，而且美國仍必須符合國際制度的程序，才能夠滿足國際規範對其行爲的正當性要求，也就是美國仍受到反映霸權規範之國際制度的影響。

全球帝國與單極順服層級架構的差異，在於其統治形式的不同。單極順服結構中的單極主宰國以領導國的身份與地位，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多邊規則與國際制度，而且本身亦受到這些多邊規則與國際制度的束縛。全球帝國雖然亦透過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多邊規則與國際制度來統治其他行爲者，不過帝國本身並不受到這些規則與制度的束縛，帝國具有單方面更動帝國層級制度的能力與權利，^⑪而且這種權力是被從屬國所認可與視爲正當。

帝國，是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關係，在此關係中，某國控制了其他政治社會的實際政治主權。^⑫帝國是一種類似輪軸狀結構的層級式政治體系，在此體系中，核心的菁英與國家，藉由提供重要互動的中介，以作爲資源由邊陲輸送到核心再回到邊陲的管道，統治邊陲菁英與社會。^⑬因此全球帝國的層級架構中，統治全球的帝國，位居全球政治、軍事、經貿、文化及知識發展典範的核心地位，它單向地對從屬國施加難以抗拒的權威性作用，但是主宰帝國卻超然於國際制度之外，具備單方詮釋國際規範的能力與地位。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全球帝國式的層級架構將是一種非正式的帝國關係，從屬國仍然維持主權國家的地位，雖然其主權的行使受到主宰國很大的限制。全球帝國的層級架構，是一種以國際地位爲區隔的層級形式，在全球帝國之下，「所有的國家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平等」，^⑭全球帝國具備更高的國際地位，一切行爲都具正當性，而且單方決定國際體系重要議題的討論議程方向與內容。

美國於 2001 年遭到恐怖攻擊，爲單極體系下全球帝國式的層級架構揭開了討論的空間。美國詮釋恐怖攻擊對全球帶來安全威脅，以此爲正當化基礎，擴大解釋國家的自衛權，對恐怖團體發動戰爭行爲，並且要求其他國家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隨後先

註⑩ Eyal Benvenisti, "The US and the Use of Force: Double-edge Hegemony and the Management of Global Emergen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5, No. 4 (2004), p. 694.

註⑪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p. 615.

註⑫ 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5.

註⑬ Alexander J. Motyl, *The Decay,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

註⑭ 參考小說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 (Harlow: Longman, 1996).

後以反恐為名，於 2001 年攻打阿富汗神學士政權，2003 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對國家主權概念採取單方面的詮釋。^⑩美國發動的全球反恐行動顯示，美國權力的行使不受拘束，放棄長久以來自我克制施展權力的立場，而且相信此種單邊政策能夠長期持久，藐視盟國與多邊協定的國際合作氣氛與精神。^⑪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仍有英國、澳洲、日本等 40 餘國派出地面部隊前往伊拉克，^⑫與美國組成多國聯軍部隊 (Multinational Forces in Iraq)，處理伊拉克新政權的移轉工作。

觀察美國是否為一個帝國的討論可以發現，美國行為正當性的訴求已經不是透過國際組織的認可，而是訴諸所謂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民主。美國堅信，而且很多奉行民主制度的從屬國亦相信並且同意，自由民主制度具備保障人權、促進和平與切合人類道德需求的特點，所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高層級的歷史發展階段；故而民主國家在國際社會中享有特殊的權利與義務，以主導國際決策與其他國家內部的發展方向。此種說詞，暗示一種以民主與否所基準的國際層級評斷。^⑬這種立論的根基，與往昔華夏帝國以是否接受「中華文明」來判斷蠻夷，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說詞與立論，其發展根基與詮釋，完全來自宰制全球地位的核心國家—美國。但是不可否認，眾多實踐民主制度的國家仍聽從美國的領導，而且懷疑非民主制度國家作為的正當性，更認為這些國家威脅到全球的穩定與安全。例如遵奉伊斯蘭神權統治的伊朗發展民用核子技術的過程，就遭到美國、英國、法國與德國的阻礙，而且以該國拒絕接受國際禁核規範為名要進行制裁。

眾多學者開始以帝國來形容當今美國的作為，更將美國列為全球層級結構中的帝國，但亦質疑美國的統治正當性。^⑭如果作為一個帝國，美國正為維持帝國的層級型態付出高昂的代價，^⑮曼寧 (Michael Mann) 更批評美國缺乏重整國際體系的能力，不可能長久維持帝國的主導地位，將會是一個失敗的帝國。^⑯美國捨棄國際制度管道的單邊作法，例如美國小布希政府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 與退出 1972 年

註⑩ Eyal Benvenisti, "The US and the Use of force: Double-edge Hegemony and the Management of Global Emergencies," pp. 688-691.

註⑪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2002), pp. 44-60.

註⑫ 多國聯軍部隊至 2006 年的參與國計有美國、英國、義大利、澳洲、波蘭、羅馬尼亞、喬治亞、丹麥、塞爾瓦多、亞塞拜然、蒙古、阿爾巴尼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亞美尼亞、波士尼亞、拉脫維亞、馬其頓、哈薩克、加拿大等。至於目前已撤出地面部隊的國家有日本、保加利亞、烏克蘭、尼加拉瓜、西班牙、宏都拉斯、挪威、多明尼加共和國、菲律賓、泰國、匈牙利、紐西蘭、葡萄牙、新加坡、荷蘭、摩達維亞、東加與冰島。

註⑬ Christian Reus-Smit, "Liberal Hierarchy and the Licence to Use For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S1 (2005), p. 76.

註⑭ Michael Cox, "Empire, Imperialism and the Bush Doctrin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4 (2004), pp. 585-608;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pp. 609-630; Michael Mann, "The First Failed Empire of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4 (2004), pp. 631-653.

註⑮ Michael Cox, "Empire, Imperialism and the Bush Doctrine," pp. 585-608.

註⑯ Michael Mann, "The First Failed Empire of the 21st Century," pp. 631-608.



反彈道飛彈 (ABM) 協議，成爲美國蠻橫的代表作，這些事件都傷害美國行使權力的正當性與美國霸權的善意面貌，¹⁰ 失去國際制度對美國行爲所提供的正當化加持。美國行爲符合民主自由全球普世價值的說詞，尚沒有爲國際體系的絕大部份成員所接受，民主自由制度國家具有特殊國際權利的國際規範，還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國際社會化過程，而且這種規範是否會強化美國的權威統治地位，其成效仍然有待觀察。從美國單邊行爲所引發的正當性爭議，可以觀察到，當今美國最多僅是一個單極順從層級結構的主宰國，美國距離全球帝國的權威地位，尚有一段距離。

柒、結 論

霸權的存在與討論，揭示國際體系內存在層級結構的事實。層級結構是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中國家地位的權威性上下從屬關係，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爭取權力資源，其終極目標，在於提昇該國相對於其他國家在國際體系的地位。維繫權力分配的優勢同時降低統治的成本，將是提昇霸權在國際社會中長保統治地位可能性的最佳選項。

國際社會中擁有權力資源的優勢，並不代表具備可以長期宰制天下的地位。憑藉優勢的物質權力資源或許可以「以力服人」、強制其他國家的行爲，但這種建築在相對權力優勢的服從關係統治成本十分高昂，而且強制性統治更迫使主宰國時刻處於依賴權力資源的困境。一旦國際體系內發生物質權力分配的消長，握有權力優勢的挑戰國，勢必肆無忌憚地取代舊有霸權的統治地位。相較之下，建構「以德服人」的統治權威正當性，將可以舒緩國際物質權力分配變動所帶來的統治危機，降低一時擁有物質權力優勢國家的挑戰誘因，鞏固從屬國對霸權的向心力。霸權即使面對一時的相對性權力資源滑落，亦不必擔心霸權統治地位的瞬間更迭，而可以利用統治權威一時難以消逝的滯性爭取必要的時間，重新取得權力資源的相對優勢。面臨霸權更迭的轉型時刻，層級結構內的霸權可以匯集更多的權力資源，以符合國際規範的正當性理由，主動因應改變現狀國家的挑戰行爲，並且取得更多的支持。

霸權的轉換與更替，關係到國際體系領導地位變動，以及國際體系內行爲體之間權威關係的重整。物質資源分配在國際體系內的變化，是霸權轉換後的結果，而不是霸權轉換的決定性原因。二十世紀初英美間的霸權轉移，並不是發生霸權戰爭的結果，而且美國在二十世紀初葉就已經超越英國，佔據當時全球權力分配的優勢地位。美國雖是一個享有權力優勢的大國，卻不是位處權威統治上位的霸權。觀察國際體系內從屬國對主宰國領導地位的認可過程，也就是霸權優勢物質權力資源轉換爲正當統治權威地位的過程，將是觀察國際體系內霸權更迭形態的關鍵。國際社會權力資源分配的更動，僅是霸權統治權威更迭的必要條件，權力資源分配的變化，並不必然會導致國際社會霸權的更迭，國際社會中權威統治核心的移動，才是霸權轉移過程的終

註¹⁰ Evelyn Goh, "Hegemonic Constraints: The Implications of 11 September for American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7, No. 1 (2003), pp. 80-89.

點。

被納入國際層級架構的國家，一旦屈居從屬國的地位接受霸權權威領導地位，而且受到國際權威規範社會化的影響將權威規範內化為從屬國的認同後，將會扈從霸權的陣營，在霸權與從屬國所互構的國際層級架構中，分享一致的層級架構規範。從屬國並且透過反映國際權威關係的國際制度，享受霸權所提供的國際公共財，並且投射對霸權地位的順服與支持。從屬國會順應並且營造符合層級權威規範的訴求，尋求霸權給予更多的支持與協助，換取在層級結構中的更多利益。

相反地，層級架構的霸權統治權威如果失去了正當性，會促成從屬國對霸權領導地位的懷疑，擴大霸權維繫其統治地位的成本。從屬國基於維護國家安全與地位的利益考量，在一個正當性崩潰的層級結構中，將受到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擺佈；或是採取自助措施強化自身的權力，或是尋覓另一個擁有權力資源優勢的國家，轉移效忠的對象，在新的層級結構中，維持原有的利益與國際地位。在一個權威統治規範動搖的層級結構中，結構內權力相對壯大的國家取代失去正當統治地位的舊霸權，將會造成本國利益極大化的效果，但是亦面臨建構統治權威性的重大挑戰；而原來層級結構中權力資源仍處於弱勢的國家投靠新的主宰國，將是避免本國利益進一步受損的最佳策略，但亦無法改變位處從屬的劣勢地位。

檢視國際體系中國際權威關係的建構與崩解過程，分析層級結構內從屬國與霸權互動實踐與權威規範的作用，解釋國際權威規範的國際社會化過程與效果，觀察國際制度在維繫層級關係的作用與角色，將有助開拓新的研究途徑；澄清霸權、權力與國際制度間的相互關係，更能探究霸權更迭與國際體系整體變遷的根本原因，彌補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體系現實態間的落差。

* * *

(收件：95年11月13日，接受：96年2月26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and Hegemonic Domination

Hsin-chih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because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could not take place in an international anarchic structure.

The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is a constructed result com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power distribution and normative authority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states seek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has four characters: the asymmetry of actor's power resourc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rank, the inequality of state's exercise of international rights, and the im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agenda-setting capability. Hegemonic state inclines to decrease her ruling cost and widen her authority i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order to obtain a durable position of superiority.

There are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in different kinds of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power, such as the original structure without hierarchy, the patron-obedience, the concert, the bipolar of loose compliance, the bipolar of institutional compliance, the tribute system, the unipolar compliance, and the world empire. Thus, in each differen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e ruling cost of the hegemonic domination is different.

Keywords: hierarchy; authority; hegemony;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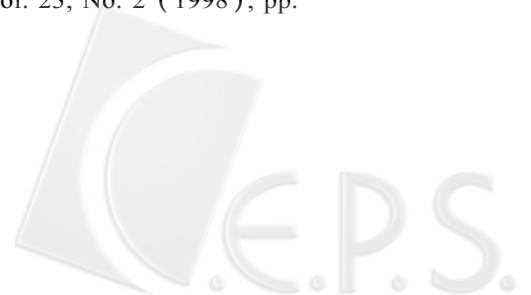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 祁美琴，「對清代朝貢體制地位的再認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6卷第1期（2006年），頁47~55。
- 韋伯(Max Weber)，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 韋伯(Max Weber)，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台北市：遠流出版社，二版，1996年）。
- 莊國土，「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係為例」，*南洋問題研究*，總第123期（2005年），頁1~8。
- 陳欣之，「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一個國際安全合作制度的孕育、持續與改變」，*政治學報*，第37期（2004年），頁111~158。
- ，「國際制度在國際霸權競逐的權力作用」，*政治學報*，第40期（2006年），頁115~148。
-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香港：太平書局，1966年）。
- 濱下武志，朱蔭貴、歐陽菲、虞和平等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制度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 謝世民，「政治權力、政治權威與政治義務」，*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1期（2002年），頁1~41。
- Albrecht-Carrié, René, *The Concert of Europe*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1968) .
- Benvenisti, Eyal, "The US and the Use of Force: Double-edge Hegemony and the Management of Global Emergen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5, No. 4 (2004), pp. 677~700.
- Blau, Peter M., "Critical Remarks on Weber's Theory of Author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7, No. 2 (1963), pp. 305~316.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Byers, Michael,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Caporaso, James A., "Dependence, Dependency,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System: A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1 (1978), pp. 13~43.
- Checkel, Jeffrey 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pp. 801~826.
- Clark, Ian, *The Hierarchy of State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 "Legitimacy in a Glob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S1 (2003), pp. 75~95.
- Collard-Wexler, Simon, "Integration Under Anarchy: Neorealis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 (2006), pp. 397~432.
- Cox, Michael, "Empire, Imperialism and the Bush Doctrin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4 (2004), pp. 585~608.
- Cox, Robert,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in Gill Stephen,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9~66.
- Cox, Robert W. and Harold K. Jacobson,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Cutler, A. Claire, *Private Power and Global Authority: Transnational Merchant Law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onnelly, Jack, "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2 (2006), pp. 139~170.
- Doyle, Michael W.,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Duvall, Raymond D.,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ia Theory: Notes Toward Precision of Concept and Argu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1 (1978), pp. 51~78.
- Eckstein, Harry, "Authority Patterns: A Structural Basis for Political Inqui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No. 4 (1973), pp. 1142~1161.
- Elrod, Richard B.,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2 (1976), pp. 159~174.
- Fairbank, John. 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Friedman, R. B., "On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seph Raz, ed., *Author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6~91.
- Galtung, Johan,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8, No.2 (1971), pp. 81~117.
- Gilpin, Robert,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Glaser, Charles L.,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 pp. 50~90.
- Goh, Evelyn, "Hegemonic Constraints: the Implications of 11 September for American Pow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7, No. 1 (2003), pp. 77~97.
- Gruber, Lloyd, *Ruling the World: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aftendorn, Helega, et al.,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art, Jeffrey,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No. 2 (1976), pp. 289~305.
- Hel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2002).
- Hobson, John M. and J. C. Sharman,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s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 (2005), pp. 63~98.
- Hurd, Ian,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2 (1999), pp. 379~408.
- Hutchings, Ross, "Empire and the State: A Critical Theoretical Assess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0, No. 3 (2006), pp. 429~438.
- Ikenberry, G. John,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1999), pp. 43~78.
- ,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American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2002), pp. 44~60.
- ,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2004), pp. 609~630.
- Ikenberry, G. John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3 (1990), pp. 283~315.
- Jervis, Robert, "Security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73~194.
- Kang, David C.,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7~85.
- ,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3 (2004), pp. 337~352.
-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Krisch, Nico,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 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No. 3 (2005), pp. 369~408.
- Kugler, Jacek and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171~194.
- Kupchan, Charles A.,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1998), pp. 40~79.



- Lake, David A., "Anarchy, Hierarchy, and th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1 (1996), pp. 1~33.
- , "The New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3 (2003), pp. 303~323.
- Lebow, Richard Ned,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1994), pp. 249~277.
- Mancall, Mark,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36~89.
- Mann, Michael, "The First Failed Empire of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4 (2004), pp. 631~653.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 Milner, Helen,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43~169.
- Motyl, Alexander J., *The Decay,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Onuf, Nicholas and Frank F. Klink, "Anarchy, Authority, Ru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2 (1989), pp. 149~173.
- Oppenheim, L.,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8th edition. 2 volumes.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1955).
- Orwell, George, *Animal Farm* (Harlow: Longman, 1996).
- Reus-Smit, Christian, "Liberal Hierarchy and the Licence to Use For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S1 (2005), pp. 71~92.
- Richardson, Neil R., "Political Compliance and U. S. Trade Domina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0, No. 4 (1976), pp. 1098~1109.
- Roeder, Philip G., "The Ties that Bind: Aid, Trade, and Political Compliance in 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9, No. 2 (1985), pp. 191~216.
- Sakai, Robert K., "The Ryukyu (Liu-Ch'iu) Islands as A Fief of Satsuma,"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12~134.
- Snidal, Duncan,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1985), pp. 579~614.
- Snyder, Glenn M.,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 Steinberg, Richard H.,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pp. 339~374.
- Sweeney, Kevin and Paul Fritz,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2004), pp. 428~449.
- Tammen, Ronald 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Alliance Formation in Southwest Asia: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in Cold War Competition," 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1~84.
-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endt, Alexander and Daniel Friedheim,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4 (1995), pp. 689~721.
- Wight, Martin, *Power Politic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 Yang, Lien-sheng (楊聯陞),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33.
-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01), pp. 43~63.

